

張云集

武新立著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孤 云 集

武新立 著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8年6月8日

书 名：孤 云 集

著 者：武新立

编 校：武铁兵 赵鹏洋

排版统筹：曹海燕

封面设计：谭 克

封底篆刻：武 斌

出 版 者：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 1205 印刷厂

开 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1500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国际书号：ISBN 978 - 962 - 450 - 668 - 6/D. 52052



武新立，河北唐县人，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生。研究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委员、纪检组长、图书馆馆长等职。

代表著作有《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主编《谱牒学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等数十篇。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和筹组“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及诸多学者建立了广泛联系。

1989年，应邀赴香港参加“亚太地区文献研讨会”并宣读论文。

1991 年,应邀赴美国参加“亚洲学年会”并访问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犹他大学、犹他家谱学会、美国国会图书馆等。

1992 年,应邀赴香港参加“中华族谱特展”并发表演讲。

1993 年,应邀赴新加坡参加“世界郭氏宗亲团体联谊会”并接受记者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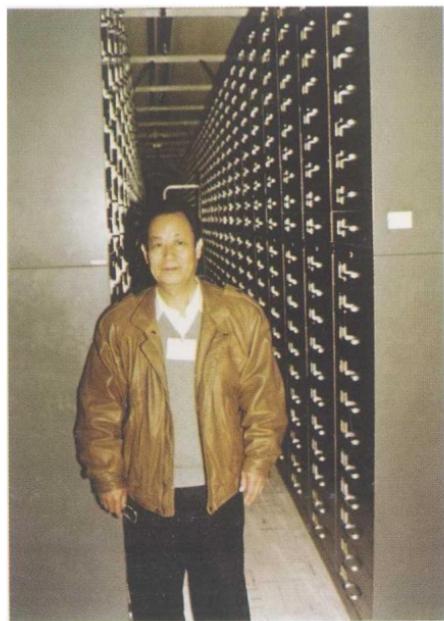
2000 年,应邀赴台湾参加“明人文集与明代研究研讨会”并宣读论文。



1.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1991.4.1）



2. 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居密博士接待（1991.4.1）



3. 参观美国盐湖城犹他家谱学会大岩洞资料库（1991. 4. 4）



4. 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前留影（1991. 3. 31）



5. 在波士顿自由之路与美国友人沙其敏先生合影(1991.3.27)



6. 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 (2000.5.4)



7. 参观台北鸿禧美术馆 (2000. 4. 30)



8. 与台湾学者吕士朋教授同游日月潭 (2000. 5. 1)



9. 在香港大学与参会学者合影 (1989.4.5)



10. 在澳门古炮台门口与澳门学者赵文房先生合影(1992.4.25)



11. 1993年12月22日，在新加坡接受记者采访，访谈录登载于1994年1月3日《联合早报》上。



12. 美国犹他家谱学会颁发的奖状，会长亲笔签发(1998.2.11)

写在书前的话

我诞生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童年和少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那时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没有良好和系统的学习环境与条件，我能勉强读完小学，已属不易。说此生将以学术为伴，真像白日做梦，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么，后来又怎样走进学术研究之门并终其一生呢？这是来到北京工作后的环境、职业与人际关系逐渐熏染、孕育、造就的结果（我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加上我的勤奋努力。所以，如果有人问到我的治学之路，我会立即回答：我的所谓治学之路，就是自学之路。不敢说“无师自通”，但敢说一生勤奋好学，学古人，学今人，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成了一生的习惯。勤奋再加上一点儿灵气，就可以出成绩，出成果，“天道酬勤”嘛！我从未妄称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成果，只是在我那个人迹罕至的狭小研究领域里，有所收获和心得而已。而正是这方面的成果，被学界和社会人士在他们公开发表的诸多文章和著述中，誉称具有某种开创性，有其学术地位。多年辛苦付出，终见其价值被认可，颇感欣慰。

我自幼爱听故事、爱看书，至老不改。小时上学，一般功课平平，惟作文一项独好，常受老师嘉奖。参加工作后，

来到北京，看书的机会多了，学习的机会多了，周围接触的全是高层次的文化人。那种名流大学和最高学府中独具的文化条件和特有的学术氛围所形成的良好环境，对我影响十分巨大，其潜移默化之功效，深刻而久远，以至终生。

工作后，我在业余学校学到高中毕业，初是中国人民大学业校，后转至文联业校。这些业校当时都很正规，所学各科与正式学校一般无二。学业状况，依如从前，作文独好。在人大业校时，我的一篇作文《记一位同志的学习》（文记同事马存柱），被刊登在人大周报上，这应该说是我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时间约在1952年，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在文联业校时，我的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讲解、传阅，因此我颇受学员们的欢迎。当时的学员，大都是高层干部。记得住在干面胡同的一位同学，就是北京市的交通局长，我们关系很好，交往甚密，他常邀我至家，吃饭谈天。业校学习，给我的文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曾与之朝夕相处的尹达先生，对我初始阶段的人生修养，整体素质的提高，帮助甚大。他使我开扩了眼界，见了世面，增长了知识，还提高了写作能力等等，我很感谢之。（参见《年谱》附录之三《我与尹达》）。

做过梁启超学生和家庭教师的谢国桢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专家。他一生与书为缘，以执着的精神从事研究工作，历经坎坷而笔耕不辍。谢老诲人不倦，他的治学思想与丰富著作惠及后学，使人敬仰。谢老对我学术方面尤多关心与提携。他77岁高龄时，奉国务院之命，带我与刘兄江南访书。一路之上，找书、看书、讲书，

全是书。什么藏家、书楼、室名、版本。什么与之有关的逸闻趣事、传说故事。无所不谈、无所不及。在天一阁，他说生平至爱野史笔记，收集资料时，他是“人舍我取”，越冷僻越好。在杭州西湖宾馆之夜，记得当时天空一钩小月，清风徐徐，老人兴致怡然，谈至黎明。由梁家教馆谈到服务于北京图书馆，由发表《梁启超少年逸事》谈到撰写《晚明史籍考》，由清华国学院时的赵万里、吴其昌、徐中舒谈到北图时的刘国钧、王重民、孙楷第、向达。处处是知识，事事有卓见。我也学他的“三勤”：心勤、手勤、笔勤。一路随听随记，后来居然成册。回到北京后，我常去府上请教，受益多多。每逢他外出讲课，不管在哪，我必前去聆听。他对我颇为赞赏之。记得一次他讲版本目录学，见我在场，课毕，竟将手稿赐我！此讲稿一直在我手保存至今。1980年我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他特意找到我，鼓励说：“新立，没想到你能写出这么好文章！真是可喜可贺！”当他得知我正在撰写《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一书时，主动提出愿为之写序，我深受感动。1982年6月5日，我又去拜访他，他很高兴，送我一册《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并于扉页即兴题诗一首：“幸逢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浪掷年华虚岁月，拾得瓜蒂结瓜成”。未久病倒，不幸于9月4日去世。未曾想到，他送给我的诗竟成绝笔，令人十分伤痛！此前，我与刘兄一起曾去医院看他，病危中，他还记着那篇序文，说如我不行了，就请重日代作，更使我感激不已！谢老是位受人尊敬的慈祥长者，我终生怀念他。

图书馆是我学术生命的沃土、知识的源泉和生存的大

地。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工作数十年，确有鱼入大海之感。它是那么广阔无际、那么无所不包的一个多彩世界！我的全部从学生涯发端于此，成果形成于此，我的整个人生都依附于此。我要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我的学术活动及其研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前期是史籍研究与成果，后期是谱学研究与成果及其相关的学术活动。

史籍研究属史料学范畴，它是通过揭示历史书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阐明其演变过程、编纂形式、内容、价值及利用情况，以为史学研究提供门径，从而服务于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丰富多彩，人生酷短，精力有限，就是名人大家，其接触面也会是极其有限的。若要寻取某种特定资料，实如大海捞针。这就需要有人专门从事对古籍的研究、发掘、考订和评介工作，以利使用者之方便。

我做图书馆工作三十余年，大量的历史书籍经手而过，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籍。我曾探询过几位史界名家，有些史书，他们竟亦茫然不知。为使这些尘封已久的古籍发挥其作用，我便深入进去，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悉心研究，写出了《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一书（1983年12月金陵书画社出版）和近10篇相关长文。也曾去北京师范大学讲授过《中国古代的书籍》专题课。

《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一书，是从千余种善本书中精选了137种，经研究考证、详加介绍撰写而成的。其特点有

三：①版本稀见。所收均为珍善孤本，多不见于别家著录。其中有名家批校、宫廷故物、稿本和抄本，此类史籍就占半数，都是一些平素不易见到的好书。②内容丰富。所收诸书，内容广泛，记事详明，史料价值很高。其中有关于明清两代的经济数据、军事法律、典章制度、社会生活、历史地理、文化艺术、学术思想、诗文评论、宗族家谱、名人逸事等等多方面的重要资料。③介绍全面。采众家之长，结构上别具一格，写法上自成体系。在考证评价每种书时，以阐述其内容为重点兼及作者生平、版本源流、史料价值、择录珍稀原文等。尤对一些重点问题，加以深入细致地比勘考异，给予评论，突破了以往类似著作简单生硬，只作表皮文章的旧格局。比如，为写《后鉴录》一篇，我先后查阅了《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西园闻见录》、《福州府志》、《明人小传》、《明诗综》、《西河全集》、《国朝典故》、《震泽纪闻》、《弇州史料前后集》、《江海歼渠记》、《鸿猷录》、《罪惟录》、《改元考》、《千倾堂书目》、《四库提要》、《藏书家考略》等二十余部书籍。考证出了《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重要史书中关于一些史事记载上的错误和疏漏。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等，乃据此文，确定了“‘刘七未死于狼山’说显系讹传”。同时，也在《后鉴录》的版本问题上，与香港大学学者何冠彪先生公开进行了一场文章答辩，证实了我对该书版本的考证是完全正确的。

此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光明日报》、《文汇报》、《清史研究通讯》、《史学史研究》以及日本

刊物《汲古》等报刊连续发表了七篇评介和报道文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鼓励。十二年后的1995年10月30日,湖北省图书馆还将其做为“填补学术研究领域空白性质”的著作,来信索要,做为馆内“重点收藏”。我寄去了一册。此书获山西省首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参见本书附录二)。

谱牒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家谱等史册。家谱最早是从记载帝王、诸侯世系、事迹开始而逐渐演变、延续下来的,它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故也成为史学的一个旁支。到了后来,发展到家家户户都修家谱,成为家有谱,县有志,国有史的一个独立门类。

血缘关系在人类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即家庭、家族、国家的历史,故封建社会才有“家天下”、“私天下”之称。这种血缘关系影响之深远,亘贯古今!作为记录血缘关系的主要资料一家谱,一向为世界各国人们所重。在极重门第、血缘和婚姻关系的中国社会中尤其如是,长期被视为是维护世家大族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诸多特权的得力工具。也被推之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宗法家族教育,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的必备必读之物。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可谓大矣。

但家谱做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文化形式、文化现象,它同时又是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它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借以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家谱又是收载宏富的资料宝库,它为研究广泛的社会、历史问题展示了丰富